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项目

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 思想比较研究

本课题组
二〇〇一年四月

前 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在增强人们的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同时，其本身的特点和弱点也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信用欺诈、坑蒙拐骗、制假售假等败德行为，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的有序运行，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尤其是经济道德规范刻不容缓。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体系中，有着十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特别是从比较的文化视野，探索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异同，揭示两个伟人思想之间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规范的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该课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全部成果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是探讨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的哲学前提、文化源泉和实践基础；第二章和第三章则重点分析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和原则；第四章至第六章主要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经济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尤其是公平效率观、消费伦理思想的比较分析。在结语部分，还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提出了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课题的研究拓展了马列主义伦理学的研究领域，也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体系。同时，有利于提高经济主体行为的道德素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规范提供了一份可资参考的研究成果。

本项目的研究由于涉及的内容较多，从而在资料挖掘方面，难免有所遗漏；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的结合是本课题研究的难点。尽管我们自觉地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有自己的探索，但仍有待深化；提出了一些见解，也需继续研究。总之，受水平所限，该成果的纰缪与言犹未尽之处，敬请专家与学界同仁赐教。

目 录

第一章 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产生·····	(1)
一、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哲学前提·····	(1)
二、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文化源泉·····	(6)
三、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实践基础·····	(10)
第二章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经济制度的伦理本质·····	(18)
一、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是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出发点·····	(18)
二、人民利益本位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归宿和出发点·····	(29)
第三章 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原则：集体主义·····	(52)
一、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原则·····	(52)
二、邓小平关于国家、集体和个人经济关系的协调论·····	(57)
第四章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规范·····	(64)
一、企业伦理思想·····	(64)
二、在经济建设中培养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	(70)
第五章 毛泽东邓小平的公平效率观·····	(77)
一、毛泽东邓小平公平效率观上的差异·····	(77)
二、毛泽东邓小平公平效率观上的共同点·····	(82)
三、毛泽东邓小平公平效率问题探索的启示·····	(84)
第六章 毛泽东邓小平消费伦理思想·····	(89)
一、毛泽东勤剑办一切事情的思想·····	(89)
二、邓小平关于个人致富的思想·····	(93)

第一章 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产生

一、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哲学前提

任何伦理思想都有它的哲学理论基础。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就是建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实事求是的哲学理论基础上的。

实事求是是我们熟知的一个哲学观点。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最先使用“实事求是”一语见于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班固为刘德作传，称道“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对此作注释时，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是说研究学问务必注意掌握事实依据，再从事实中探求出真实的规律和结论。在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中，“实事求是”主要指的是一种求实的学风和研究学问的方法。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对“实事求是”最早赋予哲学含义的是毛泽东。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重新阐释了“实事求是”的含义。“‘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在此前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还有过多次论述，并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渐使其成熟起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观点，主要包括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内容。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概括的：“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2)这一概括同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的阐述是一致的。事实上，要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必须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这是实事求是的出发点，是实事求是的最基本的要求。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出发点和基本要求。毛泽东一贯倡导从实际出发。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3) 它还说：“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4) 从事实出发，就要尊重客观实际，承认客观实际，认识客观实际；对客观实际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客观事物进行动态的考察，使思想符合客观实际，获得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

理论联系实际，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毛泽东用“有的放矢”来形象地表述理论联系实际的含义。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相互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5) 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6) 中国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反之，则会造成革命挫折和失误。

把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开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事求是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指出了主观主义的危害和纠正方法。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进一步论述了思想路线所包含的内容，并且第一次使用了“思想路线”这个概念。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在

工作中“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7)他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8)他还在批评本本主义者时说，以为靠本本就能无往而不胜的说法“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9)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概念并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含义，实际上已把实事求是规定为全党的思想路线。

然而，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曾一度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百业待举。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和确立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冲破个人迷信和“两个凡是”的束缚，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党制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标志着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不仅在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发展、充实和完善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邓小平创造性地阐述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0)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来的。这个“精髓论断”的提出，是邓小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认识的升华，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贡献。

第二，邓小平深刻地揭示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一体两面的内在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在实事求是前面加上这四个字，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这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也是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一大贡献。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和“左”的错误，以及对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原则，条条的教条式理解，使人们无法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各种新问题。邓小平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¹¹⁾邓小平还把解放思想看作实事求是的前提。他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但解放思想又不可能离开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在邓小平看来，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实际上不仅是同一过程，而且本来就是一回事。邓小平通过对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涵义的阐释，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¹²⁾这就鲜明地揭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一体两面的内在关系。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所在。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并构成科学体系的基石，贯穿在其全部论述之中，渗透到每一个论点之中。经济伦理作为邓小平经济理论、邓小平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可以说是邓小平始终坚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经济伦理领域的体现。实事求是作为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实事求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世界观基础。

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¹³⁾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处理人与世界、主观与客观关系的前导性、主导性和指导性的观念。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本分歧首先就体现在世界观上。在邓小平看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 worldview 上的根本分歧是以是否实事求是作为基础的，实事求是地看待和面对世界，就为唯物主义世界观奠定了基础，相反，则将导致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邓小平说：“实事求是，……这是唯物主义。”⁽¹⁴⁾“如果反对实事求是，……那只能引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¹⁵⁾邓小平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他多次讲过“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

的经济伦理观实质上就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经济伦理问题上的体现。

(2)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方法论基础。

邓小平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¹⁶⁾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办法和手段，毛泽东形象地把它比喻为过河的“桥”和“船”。方法论在内容上包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解决“怎么想”的问题；工作方法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解决“怎么做”的问题。二者在实践中是统一的，统一于什么？统一于实事求是。邓小平说得很明白，他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就是邓小平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伦理问题的结果。

(3)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邓小平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¹⁷⁾实际或实事是我们一切认识、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实事”不同“是”也不同；“实事”变了，“是”也会变。因此，整个认识和实践过程都要从“实事”出发，从出发点到中介过程，到最后结果都要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想当然作决定，一切问题的解决都要落空。

实事求是的“善”与实事求是的“真”是有机统一的。“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是实事求是之“真”的内涵的基本表现形式和基本要求，它反映了人们认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认识的目标选择。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实事求是之“善”的内涵的基本表现形式和基本要求，是人们行动的准则。邓小平曾经指出：“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¹⁸⁾早在建国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60年代初，他又说：“实事求是，说老实话，……

是我们党的传统。”⁽¹⁹⁾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揭示了实事求是的伦理内涵，体现了邓小平在经济伦理问题上的基本态度。

二、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文化源泉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它的思想文化渊源。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是在批判、继承和改造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特别是经济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在学习、借鉴和扬弃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的“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和方法，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的一系列经济伦理问题进行历史总结、现实反思的基础上形成和产生的。

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是以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为核心，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目标，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任务为中心的经济伦理认识和经济伦理规范。毛泽东认为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需要有一批共产主义者作先锋队，带领群众作不懈的奋斗，而所谓用民主的方法进行群众自我教育，也就是要不断提高人的德性，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人。关于到达大同之路和人生观理论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

毛泽东的经济伦理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道德遗产。毛泽东从年青时代便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教育；他学习了诸子百家和宋明理学，特别是接受了明清时代的顾炎武、顾亭林、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的道德思想影响，从而受到中国民族传统道德的潜移默化。由此，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倡导的经济伦理思想同中国古代道德遗产有一定的思想继承关系。他的克己奉公，同孔子的克己复礼；他的团结宽容，同儒家的忠恕之道；他的大公无私，同儒家的天人合一；他的热爱群众，同孔孟的博施济众；他的民主意识，同孟子的民贵君轻；他的平等公正，同儒家的大同理想；他的艰苦奋斗，同墨子的节俭自力，都有贯通之处。

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原来是用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培养圣贤豪

杰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发展的理想境界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要求；毛泽东根据人民革命实践的需要吸收了它们的积极因素和语言形式，提出新的道德规范。

毛泽东在进行道德教育时，还引用古典故事、成语，来形象地说明问题。例如：用诸葛亮出师表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说明革命到底，无私奉献；用“愚公移山”寓言，来鼓励人们坚韧不拔；用“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来说明要相信群众；用“学而不厌，悔人不倦”，来说明应有的学习态度；用“重于泰山，轻于鸿毛”来认识死的价值。

邓小平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精华，来创建改革开放的经济伦理思想。

首先，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形成改革开放的经济伦理思想。

第一，邓小平吸收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比如，孟子的较系统的民本思想，如“制民以产”的经济要求和“民贵君轻”的政治主张，强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亦天下，忧亦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思想被邓小平在新历史条件下认真吸收这一传统哲学智慧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融为一体成为自己思想方式的基点。他对一切问题的思考和评价，可以说都是立足于这个基本点。他强调在改革开放中，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得人心”都要“取信于民”，都要向中国人民交代，都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²⁰⁾作为根据。

第二，邓小平改铸和而不同的辩证方法。承认矛盾双方的“相反相成”。进而主张求得矛盾双方的和谐，以和谐来缓和矛盾，化解矛盾，这一辩证思维方法可以说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晚期，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著名命题，认为把不同东西结合在一起能产生新的东西，而把相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则不能产生新的东西。孔子进而把这一思想发展为主张“和而不同”的中庸之道，强调“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绍公二十年）张载更有“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

为，有反斯有仇，仇比和而解”（《正象。太和》）的说法，系统地表达了这一辩证思维方式。对于这种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方法邓小平结合现代中国和世界的大势，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加以吸收和重新改铸，把这种思维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成为他的思维方式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重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空间，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起了重大作用。在新时期的经济生活中他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对立，水火不相容的看法，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部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1）的全新概念。

第三，邓小平继承了历史上的革故鼎新的变法精神。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原有的条条框框要突破和改变，新的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又需要经过反复的摸索和试验，这些都是既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可循，有无别国的成功可鉴，其间自然有许多的困难，阻力，曲折，不会一帆风顺。中国出现了不少的破旧立新的改革家。他们表现出的革故鼎新的变法精神确长存史册激励后人。例如，商鞅的“治世不一通，变国不法古”（《商君书。更法》）的革新主张，韩非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的更化思想，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传》）的无谓气度，康有为的“变法而强，守旧而之”；“全变则强，小变仍之”（《上皇帝第六书》）的急切呼唤，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狱中题壁》）牺牲精神等等这些，都已经经过历史岁月的洗汰，成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不朽篇章。邓小平的开创改革开放的全新事业中，自觉地继承了这种革故鼎新的变法精神，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批判精神融合为一体，成为他的思维方式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其次，邓小平坚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世界在“开放”中发展。文化也应在“开放”中生长。邓小平把中国放在中国历

史和世界历史的纵横坐标交叉点上，提出中国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就必须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不仅包括经济、科技领域的开放，也包括思想道德文化领域的开放。开放就意味着要向世界各国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继承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包括世界一切进步的道德文明。同时。要拒绝、反对和抑制一切落后的腐朽的东西。因此，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开”与“关”的辩证关系，清醒地认识“开哪方面，关哪方面”。(22)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趋利避害”的原则正确处理了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指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23)同时又不能全盘西化。他指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一方面，不能“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另一方面，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抑制的资本主义倾向，如何正确地进行批判，还有必要继续进行研究并作出妥善的规定。”(24)邓小平改变了过去长时间内人们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往往只看到或更多地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同它的对立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的认识上的片面性。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25)就经济伦理文化而言，我们要借鉴、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平等互利、公平竞争、信守契约和注重效率等道德精神，并加以改造后融进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经济伦理文化中去。

总之，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是与他们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经济伦理文化的批判、继承、改造分不开的，可以说，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文化的精华和西方市场经济伦理文化的精华，是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形成的文化因子。

三、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有它的哲学理论基础和深厚的文化渊源，而且还有它坚实的实践基础。

任何伦理思想的产生都和其创始人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都会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

毛泽东的经济伦理思想从革命战争年代就发展起来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以人民意识为基础的三大道德原则：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奋斗，加强革命团结。围绕三条原则，提出许多具体原则和行为规范。这三大原则建国后发展为分属于导向原则、激励原则、调节原则的一系列具体原则和规范。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经济伦理思想，是为了引导和促进人们团结起来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而奋斗。早在古田会议上，针对党内和军内的绝对平均主义，毛泽东指出这是小生产者的幻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讲到对劳动英雄实行奖励。如1942年提出要“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²⁶⁾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就说过“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²⁷⁾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多次强调重视人民的物质福利，最大的用处就是可以调动人民投身革命，支持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以“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²⁸⁾但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的“功能论”决不是用“小恩小惠”去换取对他自身的“有用”，而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种杠杆，也是作为最终的目的。给人民以福利（眼前利益）——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争取实现更大的利益（长远利益），这就是毛泽东“功能性利益思想”的公式。正如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的：“唯物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29)可以看出，毛泽东指出的无产阶级功利主义、归根到底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经济伦理思想的各个侧面也正是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

刚解放毛泽东肯定个人正当利益，强调发展集体利益的思想，是立足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统一。他说过：“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30)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讲过：“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31)毛泽东这种唯物主义的集体主义观经过建国后历次高潮迭起的政治运动，被唯心主义化。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大同世界一直是中华民族追求的理想的社会模式，从陈胜吴广的“等贵贱，均贫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吸引了无数人为之奋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一直渴望把饱受贫穷，战乱之苦的中国建成一个平等、富裕、合理的新社会。但是，他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大同”、“均平”等思想的影响，因此，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国家的各项事业都快速发展之际，加之苏联的影响，毛泽东认为实现大同社会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实行进入共产主义的步骤。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废除工资制，重新采用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他指出，人活着只搞点饭吃就与狗搞点屎吃没有什么两样，‘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他认为，工资制‘是向资产阶级让步’。(32)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他还指出：“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现在在对帝国主义和自然力的双重斗争中，目标同样明确，实行供给制决不会降低人们的积极性和责任感。”(33)60年代初，他对赫鲁晓夫的政策严加抨击，认为赫鲁晓夫“鼓吹物质刺激，把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赫鲁晓夫所提倡的这种社会道德和风气，离开共产主义何止

十万八千里。”(34)中共九大期间，更明确地把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说成是“走资派”路线，必须加以全面否定和破除。怎样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呢？1960年2月《解放军报》在一篇社论中提出：“怎样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一不能靠强制，二不能靠物质刺激……更重要的，是靠突出政治，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来提高人们的无产阶级觉悟。”这样，现实社会主义被设计成了一个无利益矛盾和无利益差别、高度集中、高度计划化、行政化的产品经济社会。此时，公平被从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中抽取出来，舍去了效率而突出了公平。

毛泽东急于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与现实的交互作用表现为复杂、曲折的进程，不像人们在新中国即将诞生时预想的那样简单。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某些提法，应该随着现实的发展而有所改进。比如，他正确地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他当时没有指出（后来也未能阐明），问题的严重性特别在于：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行政权利支配社会的现象和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是极难克服的。因此经过人民共和国来实现大同理想的学说，容易受到小农眼界的歪曲。但毛泽东认为要克服这些落后思想，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就要用所谓民主的方法进行群众自我教育，要不断提高人的德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的新人。在政治泛化的年代里，认为个人利益是同无产阶级利益观绝对相悖的修正主义，片面强调或把集体主义绝对化，否定个人正当利益，似乎人人不食人间烟火，就可进入纯正无暇的共产主义社会。用精神激励代替物质激励，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被严重歪曲，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无从谈起。结果导致了经济效率的低下和经济发展的缓慢。

邓小平既总结了我国解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又准确地把握了当今世界的脉搏。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邓小平对时代基本特征的高度概括，也是他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深刻揭示。纵观世界风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间，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在紧张、动荡中发生急剧的演变。国际政治两极格局业已结束，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使得国际社会处于一个

相对稳定与和平的时代。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 (35)。当今世界总的趋势是由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洞察世界风云，冷静分析局势，改变了我们党过去对“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6)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经济是当代各国的共同要求。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问题关键是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沉思后提出的伟大战略构想。邓小平指出，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一直处于卑下地位，受尽了压迫和欺凌，人家看不起中国人。这归根到底，是由于经济长期落后。如果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是要使中国人民摆脱“处于贫困、停滞的状态”。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使中国人民“富起来”。如何使中国人民“富起来”，邓小平以一个伟人高瞻远瞩的眼光，站在中国历史和整个世界发展的制高点上，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37) 正因为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反复宣传、解释和强调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也不应变，否则。中国就会走回头路，就没有希望，没有出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新时期最重要的实践和最显著的特点。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就是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时代背景的，并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产生、发展的。

邓小平的伦理思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伦理学。建国以来，在实现战略中心转移之前，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伦理学必然是政治的伦理学，是为政治服务，即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伦理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

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伦理学必然是经济的伦理学，是为经济服务的伦理学。邓小平的伦理思想集中体现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要求，其根本内涵就在于既强调要转变观念，用经济办法、从经济角度、通过发展经济来加强伦理道德建设。又强调经济发展必须寻求道德的支持。

邓小平的伦理思想是改革的伦理学。邓小平是我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和主要倡导者，他引导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改革之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几十年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所取得的成绩与人民的希望和要求还有差距，这种曲折和差距。既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有关，也与体制上的弊端有关。邓小平指出，我国原有的社会经济体制有自己的长处，在历史上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和“左”的思想逐渐抬头，形成了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经济上缺乏活力，分配上缺乏动力，管理上缺乏效率的弊端，越来越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旧的一套是不成功的。因此，邓小平明确断定：“不改革就没有出路。”(38)“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39)据统计，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1978年10月11日到1992年“南巡谈话”，先后有13次谈到改革是一场革命。他曾指出：“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40)伦理道德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在改革的浪潮中，也必然要进行自身调整和变革，这种调整和变更的总原则就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41)。这也就是说，适应改革需要的经济伦理建设，既不是对过去的一切全盘否定，推倒重建，也不是墨守陈规，顽固不化，而应该是在保留传统的优秀的东西的前提下，大力革除不适应现代经济体制要求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树立新的与现代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使伦理道德建设有效地嵌入社会经济生活，为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人文动力。邓小平作为改革